

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1858 年日记

曹天生 张琨 何英玉合译

说明：巴拉第(1817—1878)，俗名为彼·伊·卡法罗夫。十九世纪俄国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1849 年来华，为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第 13 班的修士大司祭，1858 年换班返俄，在北京共住十年。

巴拉第返俄后，整理出版了他 1858 年的日记。该日记较为详尽地记载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参与中美、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签订的幕后一些细节情况，同时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一时期沙俄对华政策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该日记是俄《外交部通报》1912 年第二部的单行本，由圣彼得堡 В. Ф. 基尔什巴乌姆印刷厂 1912 年印行。本译材料就是根据该俄文本译出。在翻译时我们作了一些技术处理：1. 本材料译自俄文，但原文中个别地方为拉丁文的或可能会产生歧义的地方，录入原文，并加以注明。2. 个别地名、人名限于条件查不出来的，作音译处理。

【原出版说明：】

上个世纪的汉学家、修士大司祭巴拉第 (Паладий)^① 的日

^① 俗姓卡法罗夫。参见布罗加乌兹和叶弗隆（音译）编撰的百科全书。此为原书注释，以下凡未注明者均为原书注。

记已在 1860 年的《海军文集》月刊（第 48 期第 408—509 页、第 49 期第 88—105 页）上出版过。

但是，在校对保存在圣彼得堡外交部的这位已故学者的手稿原文时，发现漏刊了整整 17 天的笔记，还删减了一些内容。

日记所写的时代，正是俄罗斯远东政策的过渡时期。我们认为，由此而引起的特别的兴趣，和亲身参加谈判的作者崇高的声望，足够成为完整出版这本日记的理由。^①

皇家圣彼得堡大学编外副教授：А·И·伊万诺夫

1 月 17 日 今天颁布了中国皇帝昨天关于欧洲军队占领广州事件的圣谕。皇帝怪罪于广州总督叶名琛^②，指责他不和别的广州高级官员们商量就自作主张，与欧洲人打交道办事不力。叶名琛人不在北京，就被撤了职。接任广州总督的是前任直隶总督黄宗汉，^③并且，他还将作为全权大臣与欧洲人谈判。黄宗汉将走海路到广州，以便收集到所需的关于当前事态的情报。

叶名琛出身名门，家族中出过一些大官和学者。他以正直和实干著称。这些优秀的品质现在在中国已很难得了，因此他被派到广州担任了一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职位（即广州总督——译者注）。在“亚罗号”^④的不幸事件中，他本就应该像一个仇恨英

① 有关日记中提到的人物生平情况由 А·И·伊万诺夫和 И·И·杰斯尼兹科夫提供。

② 叶名琛（1807—1860），出生于湖北省，以严酷打击太平军著称。奉命到广州任职后，挑起了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广州沦陷后被英国人俘虏，后死于加尔各答。

③ 黄宗汉接任广州总督前为四川总督。——编者注。

④ 欧洲型号的船身，中国的圆材（桅杆、帆桁、系艇杆的总称——译者注）和帆。船员通常是在欧洲人指挥下的本地人。“亚罗”的名称是殖民者从南美传到中国的。这里所提的“亚罗”号，中欧的第一场战争就是由于中国人扣留此船而爆发的。

国人的真正的中国人那样做。民间传闻添油加醋地把广州沦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说叶名琛已被俘，现正被囚禁；有些人甚至想象出，英国人抓获了自己的对头后把他从船上扔到海里去了。关于叶名琛被俘的传闻在北京传了很长时间，与其说它让人忧虑不安，不如说它使人感到奇怪好笑。

在关系紧张时期，“亚罗号”事件成了中欧之间争执的导火索。面临着财政危机和国内大规模起义的满洲人，能够采取什么办法与欧洲人对抗呢。如果广州事件不发生，北京政府可能还在应付国内的造反和骚乱。但是现在，和强大的欧洲联军之间的力量悬殊的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整个王朝面临的可能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了。看来，不是他们执迷不悟，而是满洲人的灭亡在劫难逃了。老皇帝至今病得仍很严重，缺乏深谋远虑的军机处、亲王和大臣们掌管着事务。年轻的皇帝^①调动不起政府官员们的活力，也无力维持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

2月17日 收到我国内阁从俄罗斯发给本地俄罗斯馆的公函，终于宣布将来一个新的布道团换回我们。在对即将发生的事件焦虑不安的等待中，在中欧纠纷不断发展中，我们在北京白白呆了一年，毫无收益，我们很高兴接到这个把我们从中国牢笼中解放出来的消息。新的布道团在边境上的滞留，当然会对这里有些影响，但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为了收到彻底的成效，应该先不派新的布道团来，只召回原先的这一个，这样也不是特别好。不管怎样，这种不彻底的办法，除了让我们政府多费开支和使蒙古人受损失外，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2月27日 广州事件的后遗症开始显现出来。——理藩院命令我把葛罗男爵^②于公历2月11日从广州发给大学士裕诚的

咸丰（1851—1862）。

② 法国公使葛罗 或译为葛历劳士）布郎·简—瓦德特斯梯—路易斯（1793—1870）。

外交报告译成中文。同时，普提雅廷伯爵^① 1 月 27 日（公历 2 月 10 日）从澳门给清军机处的两个文件也被送到俄罗斯馆翻译。还没有关于英国和美国外交报告的消息。葛罗男爵的报告措辞彬彬有礼，但语气很坚定，解释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实质和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政治、贸易联系的必要性后，他赞同英国全权大使的意见，为新的条约提出七个条款：1) 在北京设常驻大使，或者至少要在特殊时期往北京派遣委托人；2) 开放中欧通商新口岸；3) 欧洲人在中国境内可自由游历；4) 在中国信仰基督教自由；5) 中国境内产品贸易自由；6) 取消中国境内关税；7) 补偿军事开支和损耗。葛罗男爵要求北京派遣全权大臣公历 3 月底去上海谈判。

普提雅廷伯爵在自己的第一份文件中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邀请他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全权代表参加将举行的谈判，并且提出三条要求：1) 自由地、毫无阻碍地同北京交往；2) 扩大贸易；3) 信仰基督教自由。伯爵也坚持要求北京派全权大臣去上海。伯爵显然没通知别国的全权大使们有关他的第二份文件的内容，这份文件提出要沿阿穆尔河左岸和乌苏里河右岸重新划定边界线。这样一来，在后一条河的源头附近发现了另一条河后，海岸这边就都划归我国了。屯居在萨哈林—乌拉的满洲居民从阿穆尔河左岸移居右岸的费用，用伯爵的话说，俄罗斯准备自己承担，并且除此之外，给中国金钱上或别的方式的补偿，最好两国之间在伊犁地区的边界也能像这样清楚地划定。

海军上将。叶甫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提雅廷伯爵（1803—1883），参加过那瓦林战斗和征服高加索的战争，远征过土库曼，是俄罗斯在里海阿斯特拉巴特湾的阿舒尔—阿德岛上第一个海军基地的奠基人。历任驻波斯大使（1842）、驻日大使（1853—1855），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驻华期间还曾三次访问过日本，又与其缔结了两个条约：长崎条约（1857）和淀川条约（1858）。1861 年任教育大臣，并于同年被任命为国务会议成员。

我发现，葛罗男爵的外交报告是发给大臣裕诚的。尽管他并不负责国际联系，而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甚至也不是军机处的成员，但仍然可以根据官服和官衔判断他是中国政府头号人物，并深得皇上的宠信。

考虑到欧洲人所提要求的实质，不可能看不出，他们是想掌握即将灭亡的中国，并使中国政府在精神上也受控于他们的意志。这将是 个不合时宜的变革。为了防止这种沉重的后果发生，最好让欧洲人限制一下他们的欲望，提些经过深思熟虑的条件。至于伯爵参加谈判一事，大概他有全权帮助欧洲人使中国政府接受他们的坚决要求，但是难道没有我们，他们就不能应付了吗？难道我们这一类人的参加能对中国政府造成什么压力不成？欧洲人在中国称王称霸，我们最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我不明白的还有伯爵关于信仰基督教自由的要求。这一条我们得不到也无所谓，它显然是想让中国人接受天主教。我们很少收甚至从未招收过新教徒，将会无力与天主教的竞争。最好完全不提这个让当地政府如此不愉快的建议，而以后，如果我们已下定决心要引导中国的宣传，可以利用欧洲在中国取得的共同权利。最后，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的问题，应该象北京政府所坚持的那样，公正地在原地解决，可却再次详尽地出现在伯爵的外交报告中，难道真的想在上海谈判中讨论这个问题吗？所有这些情况，特别是俄罗斯代表人物与中国的敌人有公开的联系和其所负有的责任，都会对这里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不管怎么说，在和中国交好时，我们不能和别的大国有紧密的来往，我们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纠纷和自己的友谊。

3 月 10 日 等待已久的理藩院给我国政府关于伯爵两个文件的复函终于送到俄罗斯馆了。像以前一样，第四项条款遭到了拒绝，建议伯爵到阿穆尔河去，为谈判准备的特派全权大臣正在那里等着他。复函中表示，在中欧之间有冲突的情况下，我们不

应该破坏邻居间的和睦，也就是说，现在，尤其是我们俄罗斯人，应该维持与满洲政府的睦邻友好关系才对。这是在拐弯抹角地暗示，我们的问题将会在阿穆尔河方面得到渴望已久的解决方法。伯爵现在又将做些什么呢？他不必离开。回函上还提到，为了和欧洲人解释清楚，向广州派去了特派全权专员。当然，葛罗男爵和伯爵所要求的关于公历三月底前向上海派驻中方全权大臣一事绝对不可能执行，因为时间太短，但是可以让黄宗汉顺路去一趟上海，和欧洲人谈判。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北京政府目光短浅，犯了重要的疏漏，它没有重视欧洲人的要求，以为他们还会从上海回到广州。

3月26日 下午我收到参加明天军机处满洲班翻译某个欧洲国家文件的邀请信。因为皇帝现在住在城郊的圆明园里，所以军机处和别的高级机关也暂时迁至那里。我们教会会馆（即俄罗斯馆——译者注）的监察员、理藩院一位叫穆彰阿的官员在那里等着我。我照例没有拒绝邀请，于是今天出发到位于圆明园附近的一个叫海淀的小镇去。我从城西的西直门出城，门外是一条直通海淀的石路，过去这条路上人很多，很热闹，而现在人却很少，死气沉沉的。这个城门附近的运河上有座石桥，很有名，因为最近几年而且现在也有好多一贫如洗的人从桥上往河里跳，也没人救，就淹死了。曾有这样的例子，全家人包括儿童和吃奶的婴儿都投河自尽了。人们偏爱这里，大概是因为这儿的水比别的地方深吧。出现这种事时，没有警察，也没有什么人出来保护这些自杀者。在走过这座桥时，我看到了河面上漂着的无人理会的溺水者的尸体，一路上都很难过。风从尚有积雪的西山上吹来一股冷空气，卷起桥边石路上和郊外平原上的灰尘。到达海淀时天已很晚了，我们在旅店门口好不容易才叫出相识的主人。出于小心，他很早就锁上了大门和所有的房门。不久以前，就在皇宫正门口的这个小镇遭到了抢劫，居民们至今心有余悸。

3月27日 上午7点，我从旅馆出来，坐上马车去皇宫。宫门前有个人工湖，夏天湖里就会开满粉红色的莲花。一条通往皇宫南门的土路把湖分为两半。南墙边铺满了帐篷，好象野战营一样，这是北京大官们吃饭的场所。他们穿着正式的官服，不拘礼节地在露天里吃早餐、饮茶，还有一些人蹲着。平底煎锅的滋滋声，汤沸时的咕嘟声，和茶馆的吆喝声充斥于耳。由私人和高头大马所拉的达官显贵们的马车也停在这里。我们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过去，来到查房厅。这间又大又空的房子是廷臣们换衣服、吃午饭和过夜的地方。在这里我和穆彰阿见了面。他给我拿了一个令牌，就是一个木牌子，用它可以进宫。我们拿着它进了皇宫大门。这个门后还有一道大门，再之后还有第三道门。像各个房门一样，每扇大门旁都躺着通报员和递送员，他们裹着羊皮袄，睡得很熟，鼾声在我们穿过的小院中回响。从最后一道大门向北延伸着一条长而宽的走廊，走廊里站满了穿着礼服的大官。这里一片肃静，有几个人在悄声耳语。走廊左右两旁各有几扇门通往各机关的临时办公室，而走廊通向一个东西跨度很大的干净的院子。走廊尽头有几间房子，左边的供王子和贵族歇息；右边是军机处的值班房，它们的入口都在院子里。北边正对的是一面东西走向的红墙。在这堵墙后，正对走廊，露出了大厅金色的屋顶，从清晨起皇帝就坐在那里处理政务。这个大厅的门不是正对着走廊，而是有些偏西，门口堵满了一大堆侍卫，都一动不动地站着。走廊里挤满了官员，他们按顺序朝觐皇上。在他们前面，走廊外的院子里站了一堆廷臣，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站在他们排头。他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站了几个小时了，看起来忧心忡忡的。我们转向右边，走进军机处的满族班。这里有两个干净的房间，站满了军机处的官员们，他们以平常的礼节接待了我。墙后往南是军机处的汉族班，有个专门的入口；往东是军机处官员们会议室的入口。军机处不是正式的官衙，它是由皇帝从著名人士

中选出的一些用于咨询和谏议的人组成的。事态紧急时，亲王、贵族、部长们和首都的高级官员，也将加入军机处。军机处就是北京内阁。军机处现有四位成员，领班是尚书伯蔭（蒙古人出身）和尚书彭（汉人）（为彭蕴章——译者注），后者比其他人更富有经验、更精明强干，他的意见总是能占上风。这个人对北京的朝政很有影响力，被看作是被疏远的汉官系统的捍卫者。两个班由来自不同部的官员和皇帝指定的人组成。

过了一会儿，满洲班领班从军机处成员那里拿到一张又长又窄的纸，像藏族人献哈达一样，横着捧递给我。我以为将要看到某个重要文件，却原来是一张从英文香港杂志上剪下的一张纸，上面印着英国和法国的全权大臣额尔金勋爵^①和葛罗男爵于公历 2 月 6 日发布的传单，宣称将于公历 3 月 10 日前，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的河与港口期间，解除对上述地区的封锁，并颁布对广州进行内部军事管理的规则。不知道军机处从哪儿弄来的这份剪下的资料。有的官员小声说，可能是黄宗汉寄来的，但更可能是在那个从上海给华北的基督教主教们运送邮件的中国基督徒的行李箱中找到的，复活节后不久他在天津被捕了。

就在我和穆彰阿把文章译成汉语时，疲惫不堪的大臣们进来过好几次，他们摘下念珠和帽子，坐到圈椅里，大口喘着气，似乎刚干完重活。这是轮值的向皇上呈递奏折的军机处成员，他们负责一字不漏地记下皇上和谏议大臣的话，然后把它们写在纸上。

译完传单后，军机处立刻把译文呈给皇上。官员们趁空围住

^① 詹姆斯·额尔金和金卡黛勋爵（1811—1863），大不列颠政府在中国的高级专员和全权代表。在此之前曾任牙买加总督。离开中国后任印度副总督（参见《Walrond》，额尔金勋爵詹姆斯八世的信件和日记，1873 年出版；《Wrong》额尔金勋爵，1905 年伦敦出版。）

我，问一些他们似乎不太明白的有关欧洲人的行动和意图。同时他们还向我打听：英俄真的停战了吗？当我作出肯定的答复时，其中一人小声说：“我不会感到奇怪，这以后普提雅廷想去哪就去哪了。”

过了一会儿，尚书带回来一个消息，说翻译已毕，按中国人的惯例以军机处名义请我吃一顿官宴。当然，我拒绝了，在一大群官员的护送下出了军机处。我的同伴穆彰阿本来是无权进这间高级办公厅的，他拿着我的皮包，有些装腔作势地摆出一副大忙人的样子。走向走廊时，我发现，宫廷议会的老大臣还站在老地方，已有些恼怒了。当我们穿过走廊时，沉默的官员让出一条道来，这使我的同伴非常激动。我们再次走过熟睡的传信人身边，最后走到扎着帐篷、车马喧嚣的广场，就好象是从黑山洞出来到了天堂一样。已经上午 10 点了，而皇帝的早朝还没结束。无论是在城郊的还是在京城的皇宫里，除了重大庆典和祭祀的日子，他每天都这样高坐在议事厅里。不要完全轻信那些恶意的谣言，似乎皇帝完全不理政事，只沉湎于后宫。实际上，他这么年轻（27 岁），而祖先留给他的只是一个混乱的中国社会，而且还让他意识到无法奢望帝国的繁荣了，甚至连安宁也是奢想；大臣们治理经验的不足，全国普遍的赤贫，所有这些老天爷对历代王朝和官宦阶级滥用职权的惩罚，使他神往一个能暂时忘却痛苦的环境。但是，他仍然掌握着政府机构的中枢，在王公大臣的帮助下，自觉地或不情愿地制定各种政治纲领、颁布各种谕令。据说，如果他能有足够的自由和精力听取新皇后的建议，他就能在她那里得到精神支持。我沉思着，回到住宅，并于当天返回了北京城。

4 月 3 日 到处都在散布关于欧洲军舰抵达天津海岸的消息。这本在预料之中的。将上演一场悲剧，序幕已经拉开。为了能有几天轻闲时间摆脱令人难过的北京印象好好休息一下，我到

城外西北郊区的一个有温泉的道观里住了下来。

4月4日 教会会馆给我一封刚从俄罗斯发来的穆拉维约夫^①写的公函。信中通知我：我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有所转变，决定与它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普提雅廷海军上将被任命为解决中欧问题的专员；如果北京政府决定请伯爵调停，并委托我传信，那我应该向伯爵转达这个政府的意愿；最终勘定阿穆尔河边界的工作由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做。这些消息非常令人高兴，因为：1) 阿穆尔问题不属于伯爵的外交职责范围，成了他当前行动的重要障碍；2) 伯爵应该对北京政府采取和平的行为，成为它和欧洲人之间的调停者，这才是有利的和体面的地位。只是我不知道这个调停的实质是什么，它能否让双方都满意？能否会有效？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调停的主意很感兴趣的，但它会不会期望过高以致大失所望？

4月10日 整个晚上风雨交加，直到今天上午才平静下来。早上，我看到周围群山山腰以上部分被雪覆盖着，空气澄净，晴空万里，远处清晰现出沟沟壑壑和河流的曲线，湿漉漉的田野上满是播种者。首都军事行动的消息从北京传到了这里，亲军和炮队正向天津出发，抵抗欧洲人的进攻。农民们也在谈论这个现实的话题。

4月11日 晚上俄罗斯馆给我一封伯爵写给裕诚大学士的公函，通知他关于我国政府对中国的和平政策。概括地说，愿意调停中欧之间的纠纷，表达了想和大学士建立私交的愿望，并且要我和一个布道团的成员到他那里去，以便他与中国全权大臣交流。公函里还有一封给我的未封口的信，信中说，如果如伯爵所坚持的那样，容许他来北京的话，请我和布道团中那位刚才提到

^① 东西伯利亚总督（1847年）阿穆尔伯爵穆拉维约夫（1809—1881），1858年签署了《中俄璦琿条约》。

的人员一起去见他。关于阿穆尔他一字未提。不知我们到海边去能对意义不明的调停起多大作用。考虑到我两次收到的信中的授意，而且我也不指望理藩院会主动跟我说这件事，我决定亲自去了解一下他的意见。我准备去跟理藩院说，根据俄罗斯传来的命令，我要申请外出，明天我就回京城里去。

4月14日 回到京城后，我从传闻中得到证实，所有的欧洲人都已到了天津港了。今天，穆彰阿应邀来到我处。我更愿与这个官员打交道，他很得大学士的宠信。当我开始解释天津事件时，发现穆彰阿早已做好了准备。他认为我去天津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同时向我说明，北京政府希望在伯爵的作用下，英国人能归还广州，并不向皇上要几百万两白银；这两条都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并且全部问题就在于不要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出于谨慎，我没有对这两个过分的要求给予任何答复，而只是提醒他，应该先弄清伯爵的意思。

4月15日 我给穆彰阿一封信，信中谈了伯爵此来天津调停的意义，并请求，如果北京最高政府接受俄罗斯友好的照会，就请允许我去见伯爵。穆彰阿没经过理藩院就把这封信送给裕诚，大学士答应把它呈报皇上。

4月18日 穆彰阿送来消息：皇上恩准我去天津，命令穆彰阿和一个理藩院的下级官员陪同。穆彰阿不止一次地坚持先前的要求，而我也只是用原来的托辞。事实上，我并不了解伯爵的意思和调停的程度。显然，他们在遭到几次不客气的拒绝后，突然注意到我国的照会，于是对伯爵的作用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他们认为我能促进伯爵积极调停此事，希望我此行能对他们大有裨益。我们决定4月22日离开北京。

4月22日 上午8点前当送行的官员来到时，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一行九辆车上路了。我对到首都东南方那些从没去过的至今仍严防着外国侵略的地方很感兴趣。到通州的石路可能会被

阻塞，所以我们从北京城南的东大门出发，走了另一条更直的路。这样一来，通州就在我们的左边了。出了大门，道路蜿蜒曲折，好象是因循运河以前的河床。路旁是耕地、茅舍和墓地。大概这里就是北京历史上某个时期开辟的从首都往西南接通黄河的引水渠。走了 25 里，我们在裕家卫（音译，Юй-цзя-вэй）镇上一家宽敞但是住房条件很简陋的大店里歇了一会儿。从北京往这个方向的旅行非常枯燥乏味而且越来越难走，周围是一成不变、毫无特色的平原，很远就能从小树丛中辨认出来的穷困的村庄，无边无际的田野，无数的坟堆，这就是一路上透过灰尘呈现在已习惯北京西郊和北郊变幻多端的山区景象的旅人疲倦的双眼前的所有景象。除了掉在地下的砖瓦外，我在路上没发现一块石头。勤劳的中国人在从这里向南延伸的广袤的平原上翻地、垫土、耕耘。北京的山消失在春雾里，我不无遗憾地挥别了它的影子，来到这一望无际、毫无遮拦的平原上。走了 25 里，我们来到很有名的张家湾镇残破的墙边，镇子坐落于白河右岸（以后将经过的所有镇都在这条河两岸）。在以前平静的年代里，它是码头和水陆换乘的地方。小镇被断壁残垣包围着。郊区的海拔比河面还低，一座美丽的小桥把它与镇子连结起来。我们没有进张家湾，而是越过石桥向东南偏南继续行进。这条小河是黄河的古老支流，它流经皇家苑囿，北京南郊的海坨（音译 Хайцзы，今南苑地区），汇入白河。走了一会儿，我们上了堤坝来到白河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它，它不是很大，河水浑浊，两岸是灰色的粘土坡。这个地方的右岸很陡，在河水的冲击下，渐渐塌陷了。河非常浅，到处都是淤泥的浅滩。几艘帆船逆流而上，还有一只大官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供官员家养住的楼船，有好多小房间，涂着赭红色。这些船用纤绳拉着前行。官船由十个纤夫拉着，他们把一端系着纤绳的短扁担背在左肩上，跟着领头人低声地喊着号子“哈、呀、嗨”，一步一步地往前挪。我不理解，这

种奇怪的帆船能在象白河这么浅的河里航行，想必是中国人的这种平底船吃水特别浅。在船顶上坐着一些乘客，叼着烟管，安详耐心地欣赏着周围空荡荡的景观。毫不奇怪，以这种方式沿河航行 350 里从天津到通州，最少要 15 天。我们在离张家湾 35 里外的马头镇（音译，*Магрой*）上过夜。我们所住的旅馆在紧临白河岸边的开阔地带，大概，也因此让我们感到有些冷。它象这条路线上的其它旅馆一样，设备简陋——真奇怪在这条路上还有人营业。在此住宿的旅人们在房间墙壁上写满了诗和随感。其中有些表达了离都而去的悲伤，和对挥泪作别的所热爱的人的思念；另外一些歌颂寂寞，等待好天气去河里游泳；还有一些嘲笑旅馆，尤其是这里确实很难闻的水，或者说一些在京城房子的墙壁上也能看到的俏皮话。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承受着在中国官方旅行的种种不便，他们象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为了照顾和保护我们，旅馆门口整夜都架着由桌椅板凳堆成的防栅，点着火把，还挂着一些灯笼；旅馆周围通宵都有几个巡逻，毫不留情地有节奏地敲着杏木做的声音很响的板子，还敲着铜锣。静夜中可怕的锣声回响在整个院子里。院中还有一个专门的守夜人，他开始不知疲倦地敲几根木棍，但我坚决反对这种安排，于是他不敲木棍了，代之以整夜学驴叫，好让人知道，他没睡着。院子里满是轻便马车和驴子，20 只驴子嚼着麦秸发出的声音像哗哗的流水声一样。我整夜都未能合眼。

4 月 23 日 天没亮，我就叫醒同伴们。院子里弥漫着寒冷而难闻的浓雾。晨曦微露时，我们出发了。道路象以前一样横贯在一成不变的平原上，仍是那些村边的树林和坟丘，左边渐渐显出长长的白河坝的弧线。远处帆船的桅杆指示着白河的流向。我们经常遇到背着沉重的装有紧急外交报告的肩袋的驿使。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从海边来的。离马头镇 17 里处我们经过安平镇旁，又走了 18 里，到了一个大镇，河西务。这条路上经过一个很美

的清真寺，寺顶上不是月亮而是被这里的穆斯林所接受的苹果。这些善于经营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后裔散居在全中国，并到处和中国人进行工商业竞争。在河西务歇息一会儿，我们继续前进。又走了 35 里，经过战略要地蔡村（俄语地名为 Цай-хунь），然后又走了 25 里到了一个位于白河北岸的著名大镇：杨村。这里是小货船的码头，它们被称作驳船，从天津往通州运送官粮，每艘船装载约二十袋米。这里有 4000—5000 艘这样的船。杨村还因是海潮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出名。穿过满是店铺的长街，我们不知不觉来到了白河堤岸上。这里河岸平坦，数不胜数运粮的驳船一只接一只逆流而上，它们沿着白河鱼贯而行，直到天尽头，桅杆连成一线，描绘出河流的曲折蜿蜒。沿岸街上都是人，非常热闹。趁着还未和欧洲人完全打起来，人们努力尽快把官粮运上通州。南风帮助运粮船逆流而上，却给我们吹来了一大阵灰尘。我们在南风中又走了 25 里，停在蒲口镇（今上蒲口）过夜。

4 月 24 日 一大早我们离开蒲口去离此 35 里远的天津。土地干硬，已有好几天没人管了，但今天却有许多农民拿着农具来了，他们预感到将会有雨，就高兴地成群结队来干活了。我们沿着河边行进，路上超过了几辆去天津和欧洲人打交道的北京官员们的马车。这一地区渐渐有了生气，白河岸边的粮库现在到了我们的左边，粮船的桅杆也遥遥可见；往右也可看到从西南来的船帆，象是航行在原野高处似的，它们是沿黄河到天津去的。黄河绕过北京地区，注入一个大湖，然后以运河的形式向东流出，并与白河在丁字沽（Дин-цзы-гу）汇合。平原上满是桅杆和帆连成的线条，看着非常有趣。丁字沽也落在我们左边了。我们沿着高高的白河堤坝继续前进。广阔的平原上美丽如画的天津呈现在我们面前，在黑压压的房屋群中闪现着明艳的花园、绿色或黄色屋顶的公共建筑和宗教建筑；路上行人和肩挑装满东西的篮筐的小商小贩络绎不绝。我们好象来到了首都。黄河上有座由八、九只

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我们到了黄河边，却不得不等一会儿，因为这时候浮桥被从中间断开让几艘商船通过。工人们唱着小调用钩竿不紧不慢地工作着。终于商船过去了，浮桥又被连起来，我们下到岸边，沿着颠簸的木桥到了对岸。接着，我们沿着高高的堤坝到下游与黄河交汇的水道去。水道上架了一座用土桥墩固定的木桥，由此往南是长长的天津市郊居民区。我们沿着窄窄的、完全由小店铺围成的马路前进，尽管天气干燥，石头铺的马路上的低洼处又脏又滑。马路通往国家运河，更确切地说，是通往渭河（Вэй-хэ）。渭河是运河往天津的延伸部分。运河上有座由 6 艘平底驳船搭成的浮桥，这里还有天津城门和海关。木板铺的上坡路太陡峭了，我们的马车不得不让几个人拉着才能上去。运河不宽，没有什么特点，象穿越峡谷一样在密集的房屋群中穿过；河水浑浊，黄黄的，像黄河里的水一样。白河在上游不远处与黄河汇合后在天津东北角与运河汇合，这个地方叫三岔河（音译，Саньчахэ）。从三岔河汇合了的河流与支流形成一条河，叫海河，向东南流去。它的入海口处有一个镇叫大沽^①。过了运河，我们向天津的北大门驶去。大街上摆着数不清的琳琅满目的特产：鱼、海蟹、水生的果子和菜园里长的蔬菜。空气湿润，充满沼泽的味道，渗入我们的衣服里，久久不散。挺进周围有许多郊区居民区，通过水路和海路运来的商品汇集在郊区，因此这里住着许多富商。我们穿过几俄丈深的北门进到城里，穿过拥挤的街道来到南门前，门两旁有许多用来防止炮击的土袋子。城中耸立着底部可通行的报信鼓楼。经过城里时我们冒失地停了一会儿，以便把银两换成铜钱。这时，过路人认出我们是外国人，就停下来在我们周围聚集起来。这一大堆人都想看看现在占住他们土地的欧洲蛮夷的模样，许多人向我们点头致意，希望能引我们说话，听

塘沽——译者注。

到我们的声音，从而对海外人能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一个骑着高头大马、穿着红衣服的护送我们的官员徒劳地向人群喊话，叫他们别吓着外国人；我的车夫爬下骡子，也徒劳地向看热闹的人们解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因此，世上没有什么值得一看的人。吵闹的人群继续围观我们，直到我们起程急奔出城。我发现天津板车和四轮大车都没有用，居民们都步行或坐轿子。

出城向南，在我们面前是一片荒凉的草原，看起来像盐碱地。从热闹的城里出来到寂静的海边平原上感觉很突兀，人口都聚集到海河两岸了。我们向东南前进，光彩夺目如沙漠里的绿洲的海光寺被抛在身后。空地上满是坟堆，像蚂蚁窝一样，但在更远处偶然可看到有耕地和菜园的农庄。整修过的平坦的公路比草原还高。离天津 10 里处，我们来到海河岸边沿着堤坝走了一段路，数不胜数的从江南和浙江经海路运米到此的南方船停泊在这里，不允许它们再往上游去。每只船都载了 1000 袋左右的米。粮食卸到驳船上后，从这里运到上游去。上海的沙船为数最多，和它们一起的有浙江的船，黑色的尾部陡而短，还有一些奇形怪状、五颜六色、长圆形的船。海河在我看来和色楞格河一样宽；河心的深度约 12—13 英尺。左岸是青青的芦苇丛，岸上很平坦光滑，象用粘土抹过一样，中国人精心装饰着这条运载着数以百万计财富的肮脏的河流。它象白河一样弯弯曲曲的，水路长度是陆路的两倍。有时，特别是夏天下暴雨时，各条支流的水注入河中，河水漫过堤坝，浊浪汹涌，决堤而出。它的河床在某些地方比城郊的地势还高，远远望去，河里的船就象是在丘陵间航行一样，那些三桅船的桅杆就像树林一样。当我们经过时，骡夫带着中国人经常看我们时所带的宽容转向我，不无自豪地指给我看那些漂浮的粮仓（米是中国人的主食）；同时为了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他伸出两个指头向唇边作出吃粥的样子。他象他的同胞一样坚信我这个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粮食。根据中国人的观点，我们

只知道羊肉和牛奶。

我们沿着这条了无人烟的平坦大道到达咸水沽。镇旁有条淡水泉，是这个地区唯一的一条。我们在此停下歇了一会儿。咸水沽离天津 50 里，跟到大沽一样远。我们决定今天到达大沽。下午 4 点左右，我们上路了。这段路和前一段一样好。空气有些潮湿，充满着近海地区所特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土壤湿润，乌云笼罩下，这片美丽的土地一览无余，薄雾中清晰可见遍布坟丘、偶有绿树林点缀其间的无边无际的郊区。我们向渐渐变宽的海河驶去。我们跨过几座美丽的小木桥。河水微溢出陡峭的堤岸，退潮后，这一片的洼地里长满了异常嫩绿的芦苇。据可靠的传说，黄河以前从这里流入大海，并留下自己的足迹：向西南延伸的湖和沼泽散布在这里的平原上；一些支流从这些沼泽和湖泊流向海河，这些像冲沟一样的支流被称为“沽”；海潮来时，支流里充满了水，缓缓向海河流去；退潮时，河水咆哮着冲向海河；有的支流上建了水闸。这里的土壤毫无疑问是由微黄的黏性的粘土形成的冲积土，由于没有石砖，人们就把它搅拌后涂在村里的房屋上，很是干净整洁。我们驶过一个很有名的大镇，葛沽。顺便说一下，同英国人开战后，大商船都被拦在这里而无权往上游航行，运往天津各店的商品由牛拉的四轮大车或小船转运，葛沽也因此而出名。象所有这一片的镇一样，葛沽的大街上也是中国很少见的干净。现在葛沽镇到处都是军队，到处都安插了军人巡查队，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几支北京亲军骑兵的巡逻小分队。离葛沽不远的地方，我们经过了一座满是北京部队的小镇，新城。这里也是保卫海河下游的军船和水兵的军港。道路两旁是美丽的果园，还间种着冬小麦，有灌溉渠和宽阔的蓄水池，池中露出去年被割下的稻秸。从这个果园过去，海岸方圆 16 里不长任何植被，只有无数的坟丘点缀着这片荒野。但是海岸并不贫瘠：渔农可以从事捕鱼业和钓海蟹，而主要的收入就是晒盐， 10